

普列汉诺夫
美学论文集

B83

311

普列汉诺夫 美学论文集

曹葆华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本书共收入普列汉诺夫自一八八八年起至一九一三年为止的有关美学的文章十九篇，他的重要美学论文可以说大多收入了。

普列汉诺夫是最早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美学和文艺问题的人之一。本书所收文章的内容有关于艺术的起源、什么是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至形象思维等；涉及的美学现象范围很广，从小说、诗歌、绘画、戏剧、音乐、舞蹈以至雕刻等等，几乎包括所有的艺术部门。

早在三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就曾从日译本转译过《没有地址的信》（书名为《艺术论》），瞿秋白同志译过《亨利克·易卜生》一文中的第九章（收入鲁迅先生编的《海上述林》上卷），冯雪峰同志也曾从日译本转译过《艺术与社会生活》。建国以来，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继续有人翻译，如吕荧同志译了《亨利克·易卜生》及《斯多克芒医生的儿子》（收于《论西欧文学》一书，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是曹葆华同志重译的（其中《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单行本）。

本书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由曹葆华同志着手翻译，由于他在十年内乱中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健康受到损害，再加上眼疾发作，严重地妨碍了本书的译述。为此我们曾请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组作了一些校订工作，补译了若干篇文章的书后注（如《尼·

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当代小市民的思想》、《如此而已》等），补做了人名索引，并为正文加了一些注。当曹葆华同志病情缓和的时候，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夜以继日把译稿全部校阅了两次。他目力不济，就让儿子读给他听，由他斟酌定稿。工作做完了，直到逝世前一小时，他还说要早日交稿，关心本书的出版。最后，本社编辑部又遵照译者的要求核对了原文，作了加工整理工作，也加了一些注。遗憾的是，曹葆华同志再也不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了。

收入本书中的《没有地址的信》一文，采用一九六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艺术》一书的中译文，只有个别地方略有改动。为了全书格式统一，补充了俄文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的书后注。至于原中文本的译者注和校者注，只要对读者有参考价值，均予保留。

目 次

格·伊·乌斯宾斯基[1888年]·····	1—70
斯·卡罗宁[1890年]·····	71—126
尼·伊·纳乌莫夫[1897年]·····	127—154
阿·里·伏伦斯基《俄国批评家。文学概论》[1897年]·····	155—194
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97年]·····	195—254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1897年]·····	255—306
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	307—447
第一封信·····	307
第二封信·····	351
第三封信·····	396
第四封信·····	399
具有概要或提纲性质的个别札记·····	442
《没有地址的信》的准备工作札记·····	443
艺术讲演提纲[1904年]·····	448—467
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	
绘画[1905年]·····	468—498
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1905年]·····	499—524
亨利克·易卜生[1906年]·····	525—589
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仇敌》)	
[1907年]·····	590—615

当代小市民的思想[1908年]·····	616—717
托尔斯泰和自然[1908年]·····	718—722
“如此而已”(一个政论家的札记)[1910年]·····	723—734
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1911年]·····	735—758
斯多克芒医生的儿子[1910年]·····	759—784
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1911年]·····	785—814
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年]·····	815—890
注释·····	891—1022
人名索引·····	1023—1051

格·伊·乌斯宾斯基¹

(献给谢·米·克拉夫钦斯基)²

农奴制度的废除给俄罗斯有思想的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没有预先弄清楚我国人民怎样生活、想些什么和趋向何处之前，是无法解决的。我国的一切和平的和革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社会活动家都了解，他们活动的性质应该取决于人民生活的性质和方式。由此就产生了研究人民、说明他们的状况、世界观和需要的自然愿望。对于人民生活的全面研究便开始了。这种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公众就以巨大的兴趣和同情来看待。公众把这些成果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把它们作为各色各样实践活动“纲领”的基础。而且最奔忙和最慷慨激昂的是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我国的“有思想的无产者”，他们以自豪的心情并且以多少可笑的独特方式自称为“知识分子”。

有教养的平民知识分子在农奴制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只是一小群人，这些人能够仿效巴扎罗夫^①达到抽象的否定，可是不能够想到成立什么“党派”。那时候除了文学的党派以外，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党派。随着农奴制度的废除，事情就起了变化。旧的经济制度的破坏大大地增加了有思想的无产阶级

^① 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喜欢否定一切，被称为“虚无主义者”。——校者

42 的数目，并且引起了他们新的希望和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大部分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不成体统的政治制度，就其本质说来既然是跟一切没有官衔的“知识分子”敌对的，所以越来越在我国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身上激起反对的精神，同时无产阶级在上等阶级和人民两者之间的地位的不确定和暧昧不明，也迫使他们思考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毫不足怪，正是这些平民知识分子这样急迫地投身于对人民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在这些从事非生产的（就这个词的经济意义来说）劳动的独特的无产者当中，有一部分较为坚决的人，在人民中间为自己反对政府的和革命的倾向寻求支柱和支持；另外有一部分主张和平的人，单纯地把人民看作是这样的一种集团，他们可以在其中生活和工作，既不牺牲自己的人的尊严，也不奉承任何首长。对这两部分人来说，认识人民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不仅急忙地从事于人民生活的研究，而且还主要地由他们写出这些研究。他们了解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市民，研究农民习惯法³，观察农村公社和家庭手工业，记录民间故事、民歌和谚语，同教派信徒进行神学的谈话，收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人民卫生状况的报道，——总之，他们探究一切，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在我国的文学中新的民粹主义的倾向产生了，并且迅速地成长起来。这种倾向的影响也表现在小说中。除了各种专门的研究，还出现了许多描写人民生活的特写、戏剧、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平民知识分子给文学带来了自己的贡献，正如他们稍后给绘画带来了自己的贡献一样，不过在绘画中他们的活动没有那样引人入胜，成效卓著。

我们既然知道作家不仅是那把他提拔出来的社会环境的表达者，而且也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知道他把这种社会环境的同情和反感、它的世界观、习惯、思想乃至语言，都带到文学里来，所以

我们能有把握地说，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艺术家，本来也就应该保持他们作为平民知识分子一般所固有的那些特点。

二

这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把它们比较一下，就能最清楚地看出来。

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是不是同，比方说，尼·亚·涅克拉索夫所歌颂的旧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相象呢？

富有魅力的辩证家，

43

思想纯正，心地洁白，

我记得你那充满幻想的目光，

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你竟致束缚于现实，

白白过着浅薄的生活，

你绝望地四处徘徊，

把美当作神崇拜……⁴

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这种自由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是同样“思想纯正，心地洁白”。在其他一切方面，他们和这种自由主义者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已经不可能“白白地过活”，“绝望地”四处徘徊，而无所事事了，因为他们不是地主，而是无产者，虽然是贵族出身。他们必须辛辛苦苦地谋求生计。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首先是专门家：化学家、机械师、医生、兽医等等。不错，在俄罗斯当前制度之下，他们也往往，几乎是永远“束缚于现实”，如果他们不想作违背良心的可耻勾当的话。他们的状况的悲惨就在于此，因而他们的头脑中就充满了“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⁵。但是对于他们周围的障碍他们已经不是袖手不管了，他们

嘲笑毫无结果的悲观失望，他们寻求实际的出路，力求改造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的兴趣在他们那里就胜过了其他一切的兴趣。纯粹文学的问题使他们感到的兴趣比较小。还是不久以前，他们甚至同艺术进行了正式的争论，他们希望彻底“毁灭美学”，认为“一个优秀的皮鞋匠比任何拉斐尔都要好些”，他们也看不起普希金，说他不研究自然科学，也没有写过具有倾向性的长篇小说。现在他们了解，这在他们是趋向极端。现在他们也乐意向艺术奉献应有的贡献，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自豪，赞扬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但是，他们现在这样作，仿佛是出于偶然似的，正如谚语所说：“工作和娱乐各有定时”。他们非常高兴地读完什么《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就又花很长的时间来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又争论起公社，又观察和研究起人民生活来。在外国著作中，他们所寻找的与其说是艺术作品，倒不如说是有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对他们说来，圣西门或路易·勃朗比乔治·桑或巴尔扎克更有意思得多，至于说到高乃依或拉辛，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这两个作家，其实他们甚至从肖格洛夫先生拙劣的历史中也知道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写的是什么东西⁶。不过，那些认为他们是“粗鲁的唯物主义者”的人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离开道德的唯物主义更远不过

44 了。他们在自己的道德方面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可是他们的唯心主义带有由于他们的社会和历史地位的特点而产生的特殊烙印。著名的马尔林斯基从前在他的一篇批评文章中曾经说过：“彼得的时代没有功夫从事于文学，它的诗歌是表现在功绩中，而不是表现在语言中”⁷。当然，这样说明“彼得的时代”的文学贫乏是相当片面的，可是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个说明，是因为马尔林斯基的话完全可以应用到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就他们自己的地位讲来，他们是抗议者和斗士。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斗争上——

不论是和平的还是革命的斗争，合法的还是“犯罪的”斗争，反正都是一样，——他们简直“没有功夫”为文学而“从事于文学”，“把美当作神崇拜”，充分地欣赏艺术。他们一心向往的正好是那“表现在功绩中，而不是表现在语言中”的诗歌。而且他们的社会活动非常富于那可以称为“功绩的诗歌”的东西之例。

如果艺术作品的内在美不大吸引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那末它的外部的装饰，例如优美的文体，更少能打动他们了，而对于优美的文体法国人至今都是极其重视的。他们准备对每一个作家说：“我的朋友，请不要说得漂亮了”，就象巴扎罗夫向年青的基尔沙诺夫^①忠告的那样。对外表的蔑视在平民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多少粗野和笨拙的语言，远为逊色于往昔美好时代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的典雅、流畅和辉煌的语言。他们有时候不仅对“美”格格不入，而且，唉，甚至对语法的正确也格格不入。在这方面竟致弄到这个地步，当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向公众讲话，尽力想以自己的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来激动公众的时候，他们因为不善于运用语言，虽然十分真诚，却不雄辩动听，而是空话连篇。大家知道，任何器官由于毫无作为，是会衰弱下去的。

因为除这一切之外，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总是十分蔑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以就不能说，他们是“富有魅力的辩证论者”。黑格尔大概不会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平民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许多严重过失，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哲学修养。

最后，不要忘记，他们对于外国语言懂得非常之差，因为在儿童时代父母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教他们，在学校里又教得非常之

① 基尔沙诺夫也是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校者

坏,到了成年顾不上学习外国语言了。因此,对于外国文学他们只是从第二手,通过译文才知道一点儿。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同“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完全相反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会说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于最主要的外国文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三

我国一般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如此,而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也是如此。在我国民粹派的文学中,甚至在民粹派小说中,也很容易看出平民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来。为了确信这一点,你可以拿,例如,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来比较一下。你立刻可以看出,这两个作家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受到教育,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给自己提出了全然不同的任务。对于构成自己时代最激动人的社会兴趣的一切事物,屠格涅夫的关切并不亚于乌斯宾斯基。但是,屠格涅夫是描写《贵族之家》日常生活的作家,而乌斯宾斯基是描写人民日常生活的作家。屠格涅夫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且几乎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看待生活现象的;甚至在他写最激动人心的题材的地方,他对于美学也比对于“问题”感到更大的兴趣。乌斯宾斯基往往是一个政论家看待生活现象的。屠格涅夫除了少数的例外,给予我们的是艺术形象,而且仅仅是形象;乌斯宾斯基在描绘形象的时候,总是附上自己的解释。当然,象几乎所有其他民粹派小说家一样,乌斯宾斯基的弱点就在于此;人们也许会向我们指出,把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的优点跟另一个作家或另一个流派的弱点对立起来是令人奇怪的事。但是民粹派小说家的这种弱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的出现恰恰是由于在民粹派作家身上社会兴趣胜过了文学兴趣。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看来,某个短篇小说或特写,

由于作者对待事物抱较客观的态度，就会博得很多好评。这一点大概作者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迫使他拿起笔来写作的，与其说是对艺术创作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想对自己和别人说明我们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的愿望。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议论就和艺术的描绘一起进行，作者往往更多是政论家，而更少是艺术家。而且，你要注意民粹派小说家的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占了政论家的上风，或者艺术家甚至把政论家彻底排除了；你不在这些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些描绘鲜明、刻画优美的人物性格，就象在《当代英雄》、《罗亭》、《前夜》和《父与子》等中看到的那样。⁴⁶你也不会在这些作品中发现那些感情奔放的场面、那些细致地观察到的精神激动，就象陀思妥也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使你们为之迷醉那样。民粹派小说给我们描述的，既不是个人的性格，也不是个人的精神激动，而是群众的习惯、观点，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生活。这种小说在人民当中寻求的不是具有自己的强烈情感和精神激动的一般的人，而是某一社会阶级的代表、某些社会理想的体现者。在民粹派小说家想象的视野前掠过的，不是鲜明突出的艺术形象，而是平淡无奇的、虽然也是迫切的国民经济问题⁸。因此，农民对土地的关系，现在就构成他们的所谓艺术描画的主要对象。有心理学家艺术家。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的保留条件下把民粹派小说家叫作社会学家艺术家。

社会兴趣之胜过纯粹文学兴趣，也说明了在民粹派小说家作品中可以强烈感到的那种对艺术加工的草率态度。我们再举出格·乌斯宾斯基的作品作例子。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场面，甚至整个的章节，它们可以为他获得第一流艺术家的荣誉。这样的场面，例如，在《破产》中就不少。但是除了这些场面以外，在同一部《破产》中可以看到一些第二流的或者简直大成问题的场

面。《破产》中最令人欢喜的、生气勃勃的人物，——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有时候简直成了滑稽可笑的，扮演着工厂工人出身的某个恰茨基^①的角色。这类不谐和的情况在他的别的作品中也很多。在这些作品中根本没有严格拟定的计划，没有各部分的相互适应，也没有部分对整体的正确关系。正如几位古代哲学家一样，格·乌斯宾斯基“没有给象征美丽、温雅、欢喜的三位女神奉献贡品”。他所追求的不是从艺术方面润色自己的作品，而是抓住他所描绘的生活现象的社会意义并且忠实地表达出来。他最后写的一些作品是和小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作者既然不大注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艺术的加工，所以就更少关心到语言，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民粹派小说家不仅不能和莱蒙托夫或屠格涅夫相比，而且甚至和甫·迦尔洵或马·别林斯基先生也不能相比。

有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突出民粹派小说的一切缺点，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嘲笑它。在他们的抨击中有许多正确的东西，然而糟糕的是，第一，他们只看见这种小说的缺点，而看不见它的优点；第二，他们觉察不出，而且由于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觉察出它的最主要的缺点。

我国的一般民粹派文学，特别是民粹派小说，拥有很大的优点，这些优点是和它的缺点分不开的，其实这是常有的情况。作为夸夸其谈和矫柔造作这一切作风的敌人，平民知识分子本来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极其真实的文学流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一直是忠实于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的。我国的民粹派小说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而且不是现代法国样式下的现实主义，

① 恰茨基是格里包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主角。——译者

因为它的现实主义充满着感情，浸透着思想。这种差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或者至少左拉主义，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在道德和智力上空虚的文学表现^①，它早就被世界历史的“精神”所抛弃。俄罗斯文学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了那在三十年期间曾经是俄罗斯最先进阶层的社会阶层的观点和愿望。上述流派的主要历史功绩就在于此。俄罗斯的社会关系在变化着（而且它们已经变化了），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上将出现一些新的更先进的阶层或阶级（这样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那时候民粹派小说，就象整个民粹派文学一样，将退到次要的地位，而让位给新的流派。但是民粹派小说的代表们将永远有权利说，他们没有白白地写作，他们当时是善于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事业服务的。

他们在描述本国人民生活的时候，就为这个事业服务了。没有任何专门研究著作能够代替他们所描绘的为人民生活的图画。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民粹派小说家的作品，就象研究俄罗斯国民经济统计著作或者农民习惯法的著述一样。没有一个社会活动家，不论他属于哪一个流派，能够说，这样的研究对于他是不必要的。看来，根据这一点，可以原谅民粹派小说家所犯的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反对美学的过错。

总之可以说，我国的美学批评家，在反对民粹派小说家的缺点 48 的斗争中，注定了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从事批评不是从应当的方面着手。要使民粹派小说家确信他们不应该关心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经常劝说他们这一点，是荒谬的。俄罗斯现在正经历着这样的时刻，它的居民中的先进阶层不能不关心这类问题。因此，不管美学批评家先生们怎样大卖力气，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必然

① 1888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些标志左拉创作中的转变的作品还不存在⁹。

要在小说中反映出来。

批评界至少应当容忍这种状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当闭眼不看我国民粹派作家艺术作品的缺点。批评界只是必须更换自己的武器。拿着学校的教鞭，如《北方通报》的一位评论家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一手拿着诗学和修辞学教本”来对待这样的作品这是可笑的。但是，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民粹派小说家对俄罗斯生活的看法究竟有多少根据，他们作品的主要艺术缺点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取决于这些看法的错误和狭隘，——这完全不是可笑的，相反地，而是十分适当的。非常可能，当批评界把争论归结为这个根据的时候，它能够指出另一个较正确的观点，这个观点一方面不把现代生活的迫切问题从小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又会消除目前小说所特有的许多缺点。在小说家成为政论家的地方，艺术批评家除了拥有政论家的武器外，就一无所有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正想从这个方面来看一看民粹派小说家中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作品。

四

格·乌斯宾斯基很早就开始写作。去年年底庆祝了他的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①。在这整个期间，一般说来，他是忠实于他一度所接受的思潮的。但是，既然民粹主义本身在若干重大的特点上起了变化，因此毫不足怪，我们的作者的作品的性质也就不能仍然一成不变了。他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格·乌斯宾斯基在他最初写的一些作品中，是一个主要描写人民生活、部分地描写小官吏生活的作家。他描绘了下层社会阶

^① 我们要提醒一下，这篇文章是写于1888年。

级的生活，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事物，却不努力借助什么理论去解释 49
他所看到的事物，甚至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理论也不见得感到兴趣。这一时期所写的作品有《遗失街的习俗》、《首都的贫困》、《冬夜》、《小亭》、《马车夫》、《破产》以及现在构成他的作品第一卷的其他特写。在这些作品中出现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城市手工业者、小官吏、低级牧师以及注定要永远为几块面包担心的这类穷人。这一切贫困的状况、这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他都是以巨大的幽默、特殊的本领以及对人类的悲哀和痛苦的最深厚和最真挚的同情来加以描写的。就艺术方面来看，这无疑是他的优秀的作品。

但是“时代改变了”，我国的民粹主义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他们认为农民是被历史号召去革新和改造我国一切社会关系的阶层。到处都听到关于“人民的性格”和“人民的理想”的议论，而且这种“性格”和“理想”又用最绚烂的色彩生动地描绘出来。格·乌斯宾斯基充满了这种普遍的兴奋情绪，也到“民间”去——当然是抱着最和平的文学目的——并且使农民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主人公。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和非常聪明的人，他很快就看出，在我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关于“人民”的概念是远远不符合于现实的。他对于这点表示了许多严重的怀疑，这些怀疑就招惹了正统民粹派对他的激烈攻击。他觉得，例如，被民粹派理想化了的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由于新的势力——金钱——的侵入，很快就瓦解了。他在描述诺夫戈罗德省的农民生活的时候说道：“凡是不很愚昧的人，凡是智慧没有被穷困所吞没的人，凡是一件事或者别的东西迫使他想到自己处境的人，凡是稍稍了解农民生活的悲惨方面的人，都不能不唯一地把满满的钱包、仅仅是钱包，当作自己的救星，而且他